

# “挑软柿子捏”的整改只能养痍遗患

本报评论员 林 琳



拆除—建设—再拆除—再建设，违建别墅仿佛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专挑软柿子捏”的整改也是一种敷衍整改、一种隐蔽性更强的形式主义和假整改。如果所有地方遇到硬骨头都绕着走、既不较真也不动真格，都等着中央来“接盘”，那么，地方政府又是如何守土有责的呢？

近日，秦岭北麓西安境内的违建别墅再次成为舆论焦点——7月30日，相关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在陕西西安召开，中央纪

委副书记任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8月4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走访多处发现，这些别墅有的已建成十多年，有的正在修建。

之所以用了“再次”，是因为当地对这些违建别墅的整治已经持续了十余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分别于2012年、2014年、2016年对这一乱象进行过报道，而结果却是问题比之前还严重。

这十多年来，若说地方政府毫无作为显然有些冤枉。从媒体报道来看，当地的整治工作从未停歇。比如立法建制层面，2008年3月起实施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1年审议通过的《大秦岭西安段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大秦岭西安段保护利用总体规划》、2013年10月起实施的《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均有严格控制、限制或禁止在秦岭相关区域山体坡开发商品住宅、别墅等房地产项目的规定和表述。执法层面，早在2003年、2004年，陕西

省政府便已开展了对秦岭违建别墅的专项整治工作；近年来更多次次表示清查出数十栋、上百栋违建别墅，并进行了拆除或没收整改。而问责层面，当地官方通报显示，2014年11月，1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90人受到组织处理；2015年，137名干部被追责，其中县处级以上56人，3名厅局级干部被立案查处。表面看，这似乎应算是一份“积极有为”的“成绩单”，而事实上，拆除—建设—再拆除—再建设，违建别墅仿佛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对此，当地政府部门如何给公众一个解释？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国土资源系统相关人员分析，这种案件的处理下去是“好处理的处理，难处理的就处理不下去，越积累难度越大”。言外之意似乎是，整治行动先挑软柿子捏，然后，就可以据此对上级有了交代。而不好惹、惹不起的，就“绕着走”“以后再说”，这不禁让人想起有人点评《西游记》的那句玩笑话，“有后台的

妖怪都被接走了，没后台的都被孙悟空打死了。”

执法、整治专挑软柿子捏，权衡来权衡去，不想得罪人，因此执法总留一些“尾巴”，这是社会治理、生态保护应有的态度和方式吗？前人把难题留给后人，新官又不理旧账，最终只能是小病养成大患，惊动中央派人来整治。

中纪委最新一轮巡视对一些地方的“软问责”进行了生动概括，高举轻放，“软”问责多、“硬”问责少；问责“虚晃一枪”，感情用事；有选择性地进行问责。对照起来，陕西省对秦岭违建别墅的处理和问责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值得反思。

最近一段时间，中央环保督察组将表面整改、假案整改、敷衍整改作为督察重点，曝光了不少地方和企业。某种角度上说，“先挑软柿子捏”甚至“专挑软柿子捏”的整改也是一种敷衍整改、一种隐蔽性更强的形式主义

和假整改。

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这是近年来屡被提及的改革精神和治理理念，实际上也是对各级各地政府部门工作提出的要求。可有些地方偏偏心存侥幸，只挑软柿子捏，是执行能力不行还是缺乏担当？如果所有地方遇到硬骨头都绕着走，既不较真也不动真格，都等着中央来“接盘”，那么，地方政府又是如何守土有责的呢？

为秦岭违建别墅问题，国家高层领导已经作了6次批示指示——地方政府觉得这个“纪录”挺“光荣”？希望秦岭违建别墅能尽快有一个令公众满意的整治结果，也希望存在类似问题的地方能引以为戒，不要再重蹈覆辙。



扫描二维码  
关注“钟鼓楼”，看  
工人日报“钟鼓楼”评论。

## 别让公摊面积成开发商“宰客”的刀

徐建辉

据8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买房子都是一件大事。但是，您买的房子名副其实吗？实际上，由于“公摊面积”的存在，您的房子会大打折扣，比如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套内面积只有70平方米了。

也许人们对公摊面积的实际含义和具体内容了解并不深，但是买过房的人都知道，开发商卖的房子基本会有公摊面积一说。所谓公摊面积，就是您房产证上标示的面积与实际居住的套内建筑面积之间的差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额？这是因为开发商将整栋楼的产权人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公用部分建筑面积分摊到了每家每户头上。通常，这个公摊面积包括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过道、地下室、垃圾警卫室等区域。

乍一看，公摊没什么毛病，既然是用之于民当然也要分摊于民了？谁家的自来水、天然气等不需要构建管道并就能直接通到家里呢？“谁受益谁负担”，看起来似乎很合理。当真如此吗？

首先，房屋公摊可谓中国开发商的独创，在国际上，卖房子基本都是按套内面积计算价格的。而到了国内，人们买了标称100平方米的房子，到手可能只有70平方米甚至更少，

这么做的依据何在呢？

其次，由于法律法规对所谓公摊面积与比率的规定与监管存在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导致这个公摊大小基本上是由开发商说了算，买房人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至于每栋住宅动辄30%的公摊比例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水分、有多大的水分，往往都是一笔糊涂账。甚至在某些地方曾经还出现过高达50%的公摊率——这与抢劫何异？

再者，很多开发商将计入公摊面积的车位对外经营，把小区内的一些公共区域也租给商户经营以收取租金。算来算去，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

此外，开发商和物业将公摊面积挪作他用，还可能损害每个业主的公共利益，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甚至可能引发业主与物业间的矛盾冲突。

现在的问题是，公摊面积真存在存在的合理性和依据吗？对其暗中暗藏的猫腻、玄机，有相应的监管和惩处机制、措施吗？为什么不能推行“阳光售房”，让广大业主买多少得多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公摊面积完全可以与土地等一样计入开发商的建房成本，而公共设施的维护运转原本就有物业费支撑也无须担心。并且，这样做其实并非不可实现。在国内，重庆早就第一个“吃了螃蟹”，取消了所谓公摊面积，那里的房子不是卖得好好的？



### 电子烟无害？

据《现代快报》报道，最近，因一名女子在北京地铁上抽电子烟和其他乘客产生争执，电子烟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北京、南京等地地铁方面均表示地铁内禁止吸烟，包括电子烟。另据专家介绍，世界卫生组织早已作出结论，电子烟是有害的，因此禁止青少年烟吸食电子烟，并宣布电子烟不是有效的戒烟手段。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人们对电子烟在销售、法律界定、吸食等多方面都存在一些误区和认识不足。比如，目前市场上的电子烟大多是通过非法渠道走私流入的，本不应该在国内销售；欧美国家研究发现，电子烟一样含有致癌成分，而且有的电子烟的尼古丁含量比传统香烟更甚；电子烟的“二手烟”一样会对周围人产生不良影响，以为抽电子烟就能在公共场合无所顾忌的想法是错误的……

明确了有些认知和常识，争议、纠纷应该会减少些吧。

李法明/图 林琳/文



## 长城上搞民宿，谁给的特权？

何勇海

据8月4日《北京晨报》报道，日前，某专做民宿的平台发布了一则“把家安在长城上”的体验招募通知，称将从11个国家的用户中选取4组人在长城住宿一夜，地点位于北京延庆。对此，有人叫好，也有人质疑此举会破坏古迹。该公司回应，这一活动得到了举办地政府和市区两级旅游部门的支持，不涉及固定物搭建，也不破坏长城风貌。

主办方声称整个活动过程中不会在长城上动一颗钉子，那么，如何在长城上搭起一间间民宿？让参与者在长城上露宿吗？据报道，长城上的一个烽火台已被装饰成一个家，“卧室”里有大床、台灯、地毯、座椅等简单家具，据说还会有一个卫生间。如此这般，还能“不涉及固定物搭建，也不破坏长城风貌”？

在《长城保护条例》中，“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被列入“禁止在长城从事的活动”。这些禁止性规定，任何单位任何人都应遵守。而将长城烽火台装饰成一

是九重山。

在打造民宿和乡村旅游方面，城口县按照“原乡、原味、原生”的理念，坚持“一村一品”、集群发展思路，力争到2020年差异化发展6-8个“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片区，使该县真正成为“全域生态大酒店”。

城口县是重庆唯一没有高速公路的县，这无疑成为该县旅游业发展的障碍。如今，该县决心构建“四通八达、外联内畅”的交通格局，向“高速+高铁”时代迈进。

据了解，G69银百高速去年已开始动工修建城口到开州路段，预计5年时间便可全线贯通，贯通之后城口到万州只需1个多小时。G69银百高速将城口和“万开云”板块紧密连接在一起，城口县也将随之成为“万开云”板块的“后花园”。

此外，渝西高铁有望在今年正式开工。待渝西高铁通车后，城口到西安、重庆两大城市仅需一个多小时。

### 1元假香水“海外镀金” 回邮最高卖200多元

(上接第1版)

多位基层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那些看似精美的日化化妆品包装，大多出自没有资质的印刷厂。造假者会把正品外包装寄给上家，上家按照正品包装去仿制、印刷、烫金、覆膜……工艺流程繁杂，有的甚至还要打样3至5次。

第三步是喷码。国内销售的名牌化妆品一般会在瓶身喷码标注生产批次，起到产品追溯和防伪功能。不少消费者也将防伪喷码作为识别正品和赝品的重要依据，却不知不法分子在这方面也能造假。

据一些被查获的制售假冒化妆品的嫌疑人交代，他们会通过一些隐蔽途径，从一些品牌化妆品内部人员处获取某一段时间市场上销售的化妆品喷码大概是什么号段，然后喷上与正品同步更新的喷码。

第四步是采购小票造假。既然是从海外代购，总得有国外的采购小票。在化妆品造假链条中，采购小票造假也是一个成熟的产业。记者采访了解到，在网络上，香港、韩国、欧洲等代购热门地的小票应有尽有，小票上的产品代码还可与假冒标签相匹配。

第五步是海外镀金。相当一部分假冒化妆品会被运往国外，然后再通过代购或海淘的形式邮回来，以便获得海外发货凭证和入境证明。谢元龙告诉记者，由于假冒产品本身价格低廉，即使算上邮费，利益仍可观，所以“海外直邮”也不一定能保证是正品。

## 重庆城口：全域旅游促发展

### 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本报记者 李 国  
本报实习生 刘学艺

城口县位于重庆最北端，与巫溪、巫山、奉节相邻。近年来，该县利用独特的生态资源发展特色旅游产品，重点打造了两个5A级景区，并努力构建“四通八达、外联内畅”的交

通格局，推动交通旅游融合发展。

城口县地方不大，却拥有多个重庆之最，如重庆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这里，大巴山连绵起伏，200米以上的山有400余座，高山河流多达700余条，森林覆盖率达67.5%，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351天，生态环境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重庆第一。

同时，城口县还是重庆的“凉都”，平均气温23.9℃。特殊的地理和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使该县形成独特云海、霞光、彩叶、烟雨、积雪、冰凌、雾凇等景观。

## 武汉出台办法严管扬尘污染

明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管单位防治职责

本报讯（记者张群）近日，武汉市对于PM2.5、PM10再出重拳，针对直接推高PM2.5及PM10贡献最大的扬尘，该市正式出台《武汉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这是该市今年拥抱蓝天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

武汉市大气污染源解析最新结果表明，扬尘对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贡献率”最大，达到25.6%，直接影响到空气质量的好坏，也给武汉空气质量改善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办法》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要做到全密闭运输，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同时，被列为重点扬尘污染源的单位应当安装扬尘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平台联网，保证其正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针对施工工地这一扬尘污染“大户”，《办法》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约束，明确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管单位的扬尘污染防治职责，还细化规定了工程施工总体要求、建(构)筑物拆除防尘、运输防尘、道路保洁作业防尘、绿化建设和养护作业以及下水道疏

浚作业防尘、堆场及搅拌站防尘、裸露地防尘等7个方面的扬尘污染防治要求和措施，从源头处形成各责任主体相互监督、共同负责、“无死角”“一条龙”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体系。

中建三局恒隆广场项目工地地处武汉闹市区，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项目智慧工地控制中心的大数据显示屏上，PM2.5、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信息一应俱全，项目安全总监付汉甫介绍，“项目部智慧工地云平台与监管部门平台联网，可以实时监控和获取各种数据，随时监控环境情况和现场安全情况，大大提高了施工现场的各类管控水平。”

“《办法》的一大亮点在于强调施工单位责任同时，也对建设单位提出具体要求。”武汉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施工单位必须设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责任牌、安装与环保部门监控平台联网的扬尘自动监控设备、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临时管控措施，建设单位也要制定扬尘防治方案，足额拨付扬尘防治费用，并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监理内容。

## 贫困县的“富广场”是一封举报信

邓海建

据8月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今年2月至5月，湖南省委第四巡视组对郴州市及其下辖汝城县、桂东县开展了常规巡视，结果发现，汝城县脱贫攻坚工作不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问题突出……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民生问题不解决，倾家荡产刷面子，结果把自己给“举报”了——两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的银杏古树，6株一字排开，挺立在县委、县政府大楼坪前；大楼正门对着的广场上，8根图腾石柱屹立于中央；仅修建爱莲广场就花了4800余万元……

尚未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哪来的钱“照亮自己的美”？答案其实很清楚。一是举债。汝城县2015年至2017年综合债务率分别为274%、285.74%、336%，逐年攀升。二是腾挪。当地财政几乎一半的钱都用在在了大搞城市开发和建设上，而培植财源、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支出不到6%。民生层面，该县卢阳镇还有一些村民家中没有通电，20多户村民家中仅靠山泉水发电和点煤油灯照明。

贫困县的“富广场”某种角度上将地方图虚荣式的发展理念，展示给了公众。

事实上，类似贪大求洋的风习并非一地之殇。2015年央视《焦点访谈》就曾曝光海南国家级贫困县临高县耗资1.3亿元建1.7公里长牌坊群。不要问这种奢华作风“谁买单”这样的傻问题，也不要问如此决策怎能“梦想成真”这样的笨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权力失范失序之后，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能起作用？

贫困县的“富广场”本身也是一封举报信，既举报了投入产出上的不合理，亦举报着政绩偏好上的走火入魔。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叫人百思难解，第一，眼睛雪亮的群众一定早就发现了这个赤裸裸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第二，从内部监督来说，“富广场”这样的标志物为何没能早点引起相关部门和问责机制的警觉？

一切不寻常之处，总潜藏着寻常的是非。脱贫攻坚还有不到3年时间，输血也好、造血也罢，前提是肌体要健康。贫困县的“富广场”等现实提醒相关部门：精准扶贫之时，也要精准鉴别贫困的成因——该帮的帮，该治的治，该惩的惩。

能轻易开。因为，今天允许商家在长城上搞民宿，明天就可能有商家打起故宫、布达拉宫等古建筑的主意，破窗效应往往是巨大的。

此项活动的主办公司称，“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是我们活动的初衷”“希望向全世界展示长城的建筑及文化魅力，共同保护长城深厚的文化遗产”，这两句话值得玩味。真正的保护应该是给文物和文化遗产减轻负担，而非不断增加其负担。长城蜿蜒万里，本身就在向全世界展示自身的建筑及文化魅力。长城的魅力已然不是“地球人都知道了”，还用靠一家小公司的民宿去宣传、增加吗？据此前的媒体相关报道，曾有驴友自发在长城上露宿，被管理部门叫停。如今的在长城上搞民宿，没有“高端”到哪里去，更不应该被纵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这么任人折腾。

###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 四次被捕入狱的中共早期党员刘天章：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

新华社西安8月6日电（记者李浩）“刘天章是我们高陵最早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党史馆解说员陈敏暑期经常带着学生们参观，烈士刘天章的英雄事迹是她每次讲解的高潮部分。

刘天章，字云分，1893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现为西安市高陵区）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1919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五四运动。为此他曾遭警察逮捕，但不久即获释。

1920年1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春，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10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等人创办《共进》半月刊，并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创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刘天章被选为共进社的常务主席兼编辑主任。

1922年冬天，刘天章加入了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为第四届执行部副主任兼会计。

1924年6月，刘天章从北大毕业后，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同年秋，在李大钊支持下，刘天章弃文从戎，到当时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所在地河南开封创办学生军，并在学生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任书记。1925年秋，刘天章任中共豫陕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与书记王若飞一起创建了开封地区的党团组织。

1927年2月，刘天章受党派遣，赴陕西任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长。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作为革命高潮时期陕西人民的喉舌，发挥了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革命运动的作用，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日销量达2000余份，是当时陕西地区销量最大的报纸。

(新华社南京8月6日电)